

无限与视角

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美]卡斯滕·哈里斯 著

张卜天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无限与视角

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美]卡斯滕·哈里斯 著

张卜天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限与视角 / [美]卡斯腾·哈里斯著 ; 张卜天译. --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

(科学源流译丛⑩)

ISBN 978-7-5357-7982-3

I. ①无… II. ①卡… ②张…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②艺术哲学—研究 IV. ①N02②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576 号

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 200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
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3-366



科学源流译丛

无限与视角

著 者: [美]卡斯腾·哈里斯

译 者: 张卜天

责任编辑: 孙桂均 吴 炜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 410600

出版日期: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630mm×970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44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7982-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前　　言

x

《无限与视角》与我的旧作《建筑的伦理功能》（*The Ethic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6）虽然讨论的议题非常不同，却是有关联的。我在《建筑的伦理功能》开头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建筑的道路一直不明朗”，并且引用了阿尔贝托·佩雷兹-戈麦兹（Alberto Pérez-Gómez）的说法，他将这种不明朗与伽利略科学和牛顿哲学所开创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认为这种世界观导致了建筑的理性化和功能化，曾为“一切有意义的建筑提供最终参照系”的“实在的诗意图”（poetical content of reality）不得不被抛弃。《建筑的伦理功能》正试图对这一内容作出阐释。

然而，那里有关建筑所说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言说现代世界：一段时间以来，现代世界的道路一直不明朗；这种不明朗同样可以与一种对实在的特殊理解联系起来。这种理解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它使我们用来肯定生活意义的那些实在层面遭到抛弃。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对这些层面作出阐释。

我们迷路时，自然会寻找地图来帮助重新定向，不仅要反思我们旅行的目标，而且要反思我们到达此处的过程以及尚未走过的道路。《无限与视角》简略描绘了这样一幅地图，在它之上回溯我们走过的道路，确定现代世界的开端位于何处，从而暗示我们本可以去哪里，以及应当往何处去。

本书源于 40 年前的反思，它促使我撰写了关于虚无主义问题的博士论文《身处异乡：虚无主义研究》（*In a Strange Land. An Exploration of Nihilism*,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61）。在这篇论文中，我的讨论对象已经包括了库萨的尼古拉，我试图从他那里找到一些线

xi

索，以帮助我们摆脱笼罩于现代世界的虚无主义阴影。本书正是要寻找这样一些线索。当然，库萨的尼古拉只是我较为详细地讨论的思想家之一，但他的工作仍然有助于指明本书的秘密核心：对我们来说，他的思辨远比其伟大仰慕者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著作更富有挑战性。

我这里提到布鲁诺是想暗示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多么不同于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布鲁门伯格的著作给了我极大启发，本书正是为了纪念他而作。在《现代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obert M. Walla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3）中，布鲁门伯格把库萨的尼古拉仍然当作一位中世纪思想家，认为他远不如布鲁诺距离我们近，据说布鲁诺已经跨越了时代门槛。然而，我们不仅试图理解现代的正当性，而且试图理解现代的限度，正因为库萨的尼古拉横跨在这一门槛两端，他才能给予我们更多教益。

XII 本书的一些想法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对我关怀备至的导师：Robert S. Brumbaugh, Charles W. Hendel, George Lindbeck, George Schrader, Wilfrid Sellars 和 Rulon Wells。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帮我找到了道路。在过去 20 年里，我断断续续讲了一门课，课名与本书标题相同，对我聚焦思想和精炼论证很有帮助。围绕库萨的尼古拉、阿尔贝蒂和笛卡儿而开设的研究生讨论班帮我检验了自己的思想。需要感谢的学生很多，我无法一一记起，这里只提 Karl Ameriks, Scott Austin, Elizabeth Brient, Peter Casarella, Michael Halberstam, Hagi Kenaan, Lee Miller 和 Dermot Moran 等人。我曾在许多地方就相关主题做过报告，也发表过关于库萨的尼古拉和笛卡儿的一些论文，书中使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与 Louis Dupré, Jasper Hopkins 和 R. I. G. Hughes 的交谈尤其使我受益匪浅。

Roger Conover 在我最初联系他时即给予热情回应，否则本书不可能现在就出版。我很幸运能够碰到 Alice Falk 这位细心的编辑。还要感谢 Jean Wilcox 的设计工作，以及 Judy Feldmann 监督使手稿成书。最要感谢我的妻子 Elizabeth Langhorne，她以自己的方式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言：现代的问题	1

第一部分 视角的力量与贫乏

第二章 视角和宇宙的无限	23
第三章 有学识的无知	44
第四章 阿尔贝蒂与透视建构	67
第五章 奇特的透视	83
第六章 阿里阿德涅之线	109

第二部分 无限与真理

第七章 真理作为上帝的所有物	135
第八章 空间的无限与人的无限	156
第九章 人的无限与上帝的无限	169
第十章 工匠人：重新发现普罗泰戈拉	198
第十一章 人的尊严	215

第三部分 地球的丧失

第十二章 哥白尼的人类中心主义	243
-----------------------	-----

无限与视角

第十三章 布鲁诺的罪行	261
第十四章 伽利略的洞见与盲目	284
第十五章 无限的暗礁	303
第十六章 哥白尼革命	323
第十七章 尾声：宇宙航行学和宇宙心智学	341
索引	354
译后记	367

第一章 导言：现代的问题

2

—

数秘主义（number mysticism）从未引起我的兴趣。跨进2000年之时，我并没有醒着见证第三个千年的到来，而是未到子夜时分便沉沉睡去。周围的人兴奋异常，而我却在睡梦中跨进了2000年，这让我感到有些羞愧。然而，即使不赋予新千年以过分的重要性，我们今天不是也卷入了一个承诺或威胁要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进程吗？如果是这样，我们难道不应对自己的前进方向至少担负些责任，而不是任凭自己随波逐流吗？

的确，我们正在跨越某个重要的文化门槛，“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等术语便是暗示。后现代似乎随现代而来，并将现代抛在后面。但这种说法必定会引出如下问题：我们所说的“现代”是什么意思？我们难道不是把与昨日旧物相对照的今日新物称作“现代”吗？于是，“现代主义”暗示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信奉主导着我们的世界及其进步的那种精神，无论这里的精神和进步作何理解。由此，“后现代主义”大概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反面：这种意识形态源于对这种精神的不满，倾向于让我们接受不同于现代性的东西。

和新千年的狂热一样，后现代主义也暗示了我们文明的不满，即对这个现代世界的广泛不满。这种不满既可以追溯前现代的过往，也可以展望后现代的未来。也就是说，不满可能会导向怀旧——悲叹现代性不再允许人把世界体验为一个为个体指定可靠位置的、秩序井然的有限宇

1

宙（cosmos），悲叹随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似乎已经丧失根基，遍布了缝隙和裂痕，本以为坚实的支撑物开始摇摇欲坠，使精神世界成为废墟。这种悲叹促使一些人尝试修葺或重建那个精神家园，以某种方式恢复业已失去的东西。但不满也可能拒绝怀旧，它确信，恢复过往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面对这个业已改变的、无法恢复的世界，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与承诺，没有认识到今天的问题与其说是失去了家园，不如说是现代世界（那个曾经富有意义且秩序井然的宇宙的相似物）把我们安顿得太好，以致已成废墟的东西仍然充当着窒息自由的牢狱。废墟和牢狱：对各种建筑的后现代怀疑在这些隐喻中得到了表达。（图1）



图1：Giambattista Piranesi, Prison (Carceri) (1745) .

因此，把某种东西（比如艺术或思想）称为“后现代”，就意味着拒绝接受现代性宣称要建立的东西，反对启蒙运动那种现在常被认为幼稚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不仅支持了科学、自由民主和国际共产主义，而且也支持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一词越过所有纯粹现代的东西，指向了某种模糊不清的“他者”，指向了某个众所希冀的、即将到

来的更光明的未来，即使它并未真正到来，即使其轮廓仍然晦暗不明。然而，考虑到后现代艺术和理论所创造的作品，这种理解也许仍然显得太过理想，过于接近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乐观主义并不那么合拍。20世纪的恐怖让我们学会了对革命狂热以及驱使它的信念保持怀疑。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也都来源于对现代世界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同样表达了一种后现代的敏感性。⁴难怪残存的文化先锋派的心态已经“从激烈变成了颓废，变成了萎靡的犬儒主义”。^①

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晚于现代主义的事物是错误的。后现代主义反映了现代性的良心愧疚，显示了对现代性缺乏正当性的怀疑，这种怀疑从一开始就为现代世界投下了阴影。在20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怀疑日渐增长。在美国，对越战的深刻反省削弱了美国那种幼稚的自信，加深了这种怀疑，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怀疑则被棘手的经济、社会、种族、性别、宗教和生态问题所强化。后现代主义言辞表达了一种日益加深的怀疑，即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所走的道路必将导向灾难。绝望与希望（绝望要比希望更清晰）在这种自我怀疑中混合在一起，二者往往都聚焦于现代科学，尤其是科学所造就的不断扩张的技术。⁵

我认为，我们现代人不再把我们的世界体验为一个秩序井然的有限宇宙，一个为我们遮风挡雨、提供居所的房屋。那一比喻促使我们以建筑师的形象来思考上帝，以上帝的形象来思考建筑师，以上帝和建筑师的形象来思考试图重建宇宙秩序的哲学家。哲学家也想成为建筑师，成为教诲者——“教诲”（edify）一词引人深思：这个词原先仅指建造一座房屋或建筑物，后来开始指“在道德或精神上有所改进”，今天则往往有一种负面含义。为什么会对各种教诲持有怀疑呢？这个词在含义和内涵上的转变促使我们审视最近流行的对建筑的攻击。考虑“解构”一词及其所有含义。例如，我们如何理解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尝试在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建造一座反建筑的建筑，或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合作参与这一项目呢？德

^① 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4), p. 114.

尼·奥利耶 (Denis Hollier) 指出：“这样一个项目要求意义的丧失，赋予它一种酒神的层面：它与屈米所谓的建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建筑结构中固有的意义观念’——明显相冲突。拉维莱特公园是后现代‘对意义的攻击’，它称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拆解意义’。”^①

我们是因为深受意义过量之苦，才希望拆解意义的吗？意义是否成了阻碍我们通达酒神迷狂的牢狱？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反对建筑的立场所欣赏的当今时尚？巴塔耶认为，建筑代表了一种囚禁我们的秩序，因此应当被摧毁，即使这种摧毁会带来混乱和兽性（图 2）。奥利耶引用巴塔耶的话说：“显然，纪念碑会在社会中激励社会利益行为 (social good behavior)，甚至激起真正的恐惧。巴士底狱的骚乱正是这一事态的象征：若非通过人民对作为其真正主宰的纪念碑的敌意，就很难解释这一群众运动。”^②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纪念碑有时会激励良好行为 (good behavior)，甚至是真正的恐惧，它因此就显然应当拆除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难道因为过多的“良好行为”而苦不堪言？我们应当释放弥诺陶洛斯 (Minotaur)^③ 吗？这种信念透露出一种深深的自我仇恨。正如巴塔耶认识到的，这种对于作为我们真正主宰的纪念碑的仇恨最终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仇恨：

在巴塔耶看来，这正是无头怪这一神话形象旨在表明的东西：
人要想逃脱建筑的锁链，不成为囚犯，唯一的途径就是逃脱他的外

①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p. xi.

② Ibid., p. ix; quoting Georges Bataille, “Architecture,” in *Oeuvres Complètes*, 12 vols. (Paris: Gallimard, 1971—1988), 1: 171—172.

③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上的半人半牛怪，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之妻帕西法厄与波塞冬派来的牛的产物，拥有人的身体和牛的头，弥诺斯在克里特岛为它修建了一个迷宫。由于弥诺斯的儿子安德洛革俄斯在阿提喀被人阴谋杀害，弥诺斯起兵为儿子报仇，给那里的居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为了平息弥诺斯的愤怒，解除雅典的灾难，雅典人向弥诺斯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为进贡，弥诺斯接到童男童女后，将他们关进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居住的克里特迷宫里，由弥诺陶洛斯把他们杀死。在第三次进贡的时候，年轻的忒修斯带着抽中签的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一个线团破解了迷宫，又用她交给自己的一把利剑斩杀了弥诺陶洛斯。——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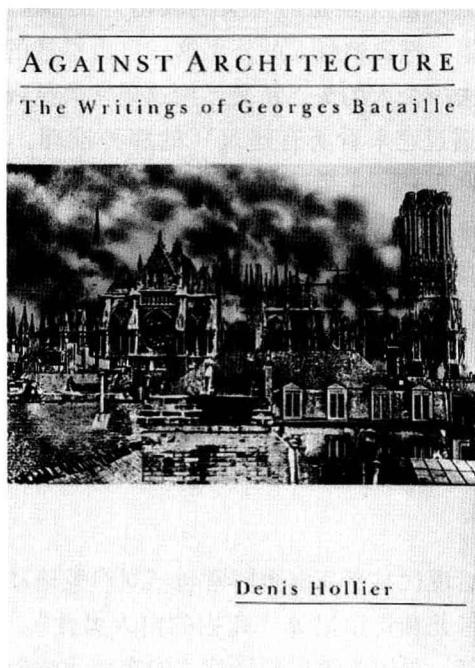


图 2: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9) 封面。

形，失去他的头。事实上，对一个人自身外形的这种自我猛攻要求一种比简单的毁灭或逃生卑劣得多的策略。因此，应把无头怪的形象视为一种掩饰，视为涉及拆解“意义”的那种反纪念碑疯狂的否定形象。画家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画出了这一形象，巴塔耶写了一则格言与之相配：“人会像犯人逃脱监狱一样逃脱他的头。”^①

^①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9), p. xii.

这种对建筑的攻击（也是对意义的攻击）的前提是一种诺斯替主义（gnostic）欲望，想要逃脱人的外形这一自由精神的监狱，即使这种解放的代价是失去一个人的头。正是运用这里使监狱成为建筑作品之典范（一种透镜，透过它来看所有建筑）的那种推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称 $2+2=4$ 是厚颜无耻，而把 $2+2=5$ 誉为自由的最终避难所，这种自由可以抵制安排，梦想迷宫和混乱：我们的头难道不是成了我们的监狱吗？但这样一种脱离原位的自由最终也会连同身体和头而失去自身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自由问题。

二

可以预见，后现代主义言辞也时常包括对启蒙运动及其创始人的批判，如康德、笛卡儿和哥白尼等“死去的白人男性”。他们的遗产和建筑物现在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帮助建立的东西无法回答我们深切的渴望。本书的一个目的便是通过处理这个模糊不清的失败来阐明自由问题。对于把现代世界建成一座理性建筑的质疑并非新的现象：早在 8 1887 年，最常被后现代主义者引用的先驱者尼采就已经悲叹：“自哥白尼以后，人似乎被置于一个斜坡上，人已经越来越快地滑离了中心位置——滑向何方？滑向虚无？滑向一种彻骨的他自身的虚无感？”^① 希腊或中世纪的宇宙为人类赋予了临近中心的位置，而哥白尼革命却似乎宣告我们处于偏心位置。诚然，偏心仍然预设了一个中心：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鉴于哥白尼仍然处于现代世界与中世纪世界之间的门槛上，他本人仅仅是一个半心半意的现代主义者，他仍然坚持认为宇宙有一个中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III, par. 25, in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ed. 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Berlin: de Gruyter, 1980), 5: 404 (本版此后缩写为 KSA).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as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New York: Vintage, 1989), p. 155.

心，继续援引一位神圣的建筑师以及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界宇宙的观念；他只是否认地球处于那个中心位置，而把中心留给了太阳。但我们也会看到，与从地心宇宙观转变为日心宇宙观相比，远为重要的是人的理性被赋予的自我提升能力，它能把思维主体从任何特定位置解放出来。这种自我提升，这种新的自由，这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与一种新的无家可归感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征并不专属于哥白尼：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那个有界的、家园般的宇宙早在化为废墟和遭到遗弃之前很久就已经遭到了动摇。

很难说是尼采第一次用华丽的辞藻揭示了后哥白尼宇宙的虚无主义内涵。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1819）第二卷开头说道：“在无尽的空间中有无数发光球体，每一个球体周围都有十几个较小的发光球体绕之旋转，它们核心滚烫，外面包裹着一个坚硬冰冷的壳；这个壳上一个发霉的薄层产生了有生命和能认知的存在者；这就是经验真理，真实的东西，这个世界。”^① 如此理解的经验真理，亦即我们的科学，对特有的位置、对绝对价值、对家一无所知。如果那个真理被等同于唯一真理，那么我们若是想摆脱虚无主义，难道不是必须掩盖这一真理，或者干脆放弃它吗？莫非坚持唯一真理是好生活的一个障碍？

在年轻时写的片断《论道德意义之外的真理与谎言》（“On Truth and Lie in an Extra-Moral Sense”）一开头，尼采便采用了叔本华那阴沉而又崇高的看法。这种看法颇受厌倦了所有中心的后现代批评者欢迎，它使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种厌倦要比怀旧更好。一个回答是继续坚持一种相当现代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漂浮的自由需要被具体化（如果不是破灭的话）；因此，对家的一切代用品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主义者曾梦想在酒神的狂喜中失去自己。⁹

让我们回到尼采对叔本华故事的复述：“从前，在分散成无数闪烁的太阳系的宇宙的某个偏远一隅有一颗星，在它之上有聪明的野兽发明

^①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 E. F. J. Payne, 2 vols. (New York: Dover, 1966), p. 2; 3.

了认知。这是‘世界历史’最为傲慢和虚假的时刻，但尽管如此，它只有片刻光景。自然呼吸了几下之后，这颗星便冷却和凝结了，聪明的野兽不得不死去。”^① 尼采强调了我们的生活时间与世界时间之间巨大的比例失调：^② 这个几乎把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归于毫无意义的宇宙关心我们吗？屠格涅夫（Turgenev）让他笔下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Bazarov）在《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 1862）中表达的也是这种比例失调：

我在想，我父母倒也活得自在！父亲已六十余岁，一大把年纪了，可还在谈论“安慰剂”，还在治病，与农民交往中讲究宽容、厚道，一句话，自得自在。母亲也不错：整天忙吃的，吃得了打哼哼，压根儿想不到别的。可我……我想到，躺在这干草垛旁边。我所占有的这一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狭小，而广大空间里不存在我，与我无关。我得以度过的时间在永恒中非常渺小，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无我。但在这个原子中，在这个数学点上，我的血液却在循环，头脑却在工作，却有所冀盼。……这不令人作呕吗？这不琐碎无聊吗？^③

这里幸福与积极忘我地投入生活联系在一起，虚无主义与思想者本人茫然出神的视角联系在一起。巴扎罗夫百无聊赖地躺在干草垛旁，体验自己在无限中漂流，宛如一个异乡人，找不到地方来安顿自己。有什么东西可做根基？有什么中心可定方位？这里，无限宇宙的思想也与虚无主义和自我厌恶联系在一起。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KSA 1: 875. Trans. as “On Truth and Lie in an Unmoral Sense,” in *Philosophy and Truth: Selections from Nietzsche's Notebooks of the Early 1870's*, trans. and ed. Daniel Breazeal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 p. 79.

②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③ Ivan Turgenev, *Fathers and Sons*,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p. 148—149.

里尔克《马尔特手记》(Note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1910) 中的尼古拉·库斯米奇 (Nikolaj Kusmitsch) 表达了相关情绪。库斯米奇不安地发现，我们这个看似很稳定的地球，这个据信坚固的大地，事实上在运动：

就在他的脚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只动了一下，而是连续动了好几下，混合着奇怪的晃动。他吓呆了：难道是地球在动？真的，确实是地球。确实是地球在动。他曾在学校里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但当时只是蜻蜓点水地学了一下，之后就束之高阁，再也不愿做深入探究了。况且，地球运动也不是什么适合谈论的话题。……其他人也能感觉到地球运动吗？或许能，只是他们心照不宣而已。或许对那些水手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①

可以肯定的是，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库斯米奇知道地球在运动。但社会及其关于坚实大地的虚构掩盖了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这样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混合体，既接受科学，又掩盖了其关于存在的意涵。后现代主义称得上更为诚实，因其愿意面对这些意涵。于是，库斯米奇被一种体验吓坏了，即他已经知道运动的东西事实上在运动，我们的地球是一艘船。^② 正如布莱斯·帕斯卡 (Blaise Pascal) 所认识到的，我们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位于汪洋大海中，踏上了一段没有明显目标的旅程。

难怪尼采会把哥白尼与虚无主义联系起来：“人的自我贬低和如此做的意志，自哥白尼以来难道不一直在加剧吗？唉，对人的尊严的信仰、对人的独特性的信仰、对人在存在的巨链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信仰已成过去：人变成了动物，不折不扣、毫无保留地变成了动物。而根据旧时的信仰，他几乎就是神（‘神之子’，‘神

^① Rainer Maria Rilke,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in *Werke in drei Bänden*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1966), 3: 269. Trans. Walter Kaufmann i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Meridian, 1956), p. 119.

^② Cf. Hans Blumenberg, *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创造的人’）。”^①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于哥白尼还有另一种积极得多的解读，启蒙运动因此把哥白尼誉为一位伟大的人类解放者。但这两种反应都认为哥白尼标志着我们现代世界模糊的开端，现代世界被自由问题的阴影所笼罩，自由问题不可避免也是意义问题，是意义有可能丧失这一问题。

这种现代理解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现代与中世纪有决定性的不同，将两者分隔开来的东西堪称一场革命。¹¹ 要想理解现代世界的起源，理解它的状况、正当性或非正当性，就必须理解这场革命的实质（如果这里确实有权谈及革命的话）：我必须回到这一点。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尼采把哥白尼革命与人类自我认识的一场转变联系了起来，这场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因为它尚未面对上帝之死的全部含意；因为它已经掩盖了自己的含意，一如库斯米奇认为“他们”掩盖了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地球的运动。在“他们”看来，他的焦虑似乎是一个狂人的焦虑，是尼采笔下那个狂人的被驯化的继任者的焦虑。关于这个狂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Gay Science*, 1882）中是这样说的：

你听过狂人的故事吗？他大白天打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找上帝！”“我找上帝！”……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喊道，“我来告诉你们！是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都是他的谋杀者！但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有能力喝干海水吗？谁给我们海绵去擦掉整个地平线？当我们把这个地球从它的太阳那里释放时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它将

^①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III, par. 25, KSA 5: 404; trans.,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p. 155.